

#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新馬華人對地名的 詮釋與標準化

——以新加坡《叻報》為主要研究材料（1887-1932）

白偉權

新紀元大學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 提要

本研究旨在藉由《叻報》當中的地名，討論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華人大量移入馬新地區，與不同文化接觸之後，對於該新環境地理知識的形構過程。《叻報》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本區最重要的中文報章，總部在新加坡，廣泛發行至馬來半島及其周邊地區。該報新聞內容大多牽涉東南亞各地，而當時許多地區也正處於大開發時期，許多今天為人熟知的地名，對當時的華人而言，仍算是新的接觸，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各種外來語的詮釋及標準化過程，因此創造出許多新的地名。為此，本研究將針對《叻報》所出現的地名進行蒐集，輔以其他地名材料，討論這些地名在時間軸上的標準化過程以及空間分佈趨勢，從中了解早期南來華人地理空間觀的形塑與變遷。

**關鍵詞：**叻報、新加坡、馬來亞、地名、海外華人

---

白偉權，新紀元大學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馬來西亞雪蘭莪州，電郵：weechuen.pek@newera.edu.my。

本文發表於2017年12月19日中央研究院明清史推動委員會主辦「2017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與會先進以及國立東華大學康培德教授惠賜意見，特此致謝。另外，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師長的細心閱讀，並提供專業及寶貴意見，若文章尚有疏漏缺失之處，由筆者自負文責。

## 前言

東南亞是漢文化、南島民族、南亞、西亞以及歐洲文化接觸的重要場域，各種文化相互交流下形塑出東南亞華人文化本身的多元性。近幾十年來，隨着中國對外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中外文化的互動以及海外華人研究相關的議題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目前，相關研究多聚焦於海外華人在東南亞與其他族群文化接觸之下，如何形塑出新的在地化認知。這些在地化的認知以及對其他族群文化的吸納都是形塑東南亞華人特殊性的元素。東南亞的經驗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數百年前華人移居華南以及臺灣時，與當時居住於當地的南島民族之間的互動圖像。<sup>①</sup>

在東南亞中外文化接觸的研究領域當中，又以語言學相關面向的研究最常作為切入前述議題的途徑。Phyllis 從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的角度呈現新加坡在英殖民時期以來的多元族群互動當中，華人移民以及其他族群的語言如何吸收彼此的元素，而形塑出今天「新加坡人」的文化底蘊，企圖藉語言回應一般對於殖民地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族群間分群而居、缺乏交流的理解，並且指出在地化的語言與詞彙在族群認同建構、在地特殊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sup>②</sup>蘇慶華則以19世紀馬六甲青雲亭的文獻《呷國青雲亭條規簿》及《同堂會議記錄簿》說明當時福建人在語言文字上如何吸收馬來語創造出各種當地特有的音譯詞，作為正式文件書寫的用語。<sup>③</sup>康培德曾經以18至19世紀荷印巴達維亞的華人為研究對象，透過華人自治組織——巴國公堂《公案簿》當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的使用變遷，討論華人如何去建立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sup>④</sup>

事實上，19世紀華人在東南亞的文化接觸與內化的現象也影響了今天東南亞地區的華人語境，洪麗芬與羅榮強的研究顯示現今馬來西亞的福建話當

① 康培德，〈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漢學研究》，第35卷，第1期（2017年3月），頁261-290。

② Phyllis Ghim-Lian Chew,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of Early Identities in Singapore: From Colonialism to Nationalism*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③ 蘇慶華，〈《呷國青雲亭條規簿》及青雲亭《同堂會議記錄簿》中所見閩南方言及音譯外來語詞匯初探〉，《亞洲文化》，第15期（1991年），頁110-115。

④ 康培德，〈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頁261-290。

中便擁有許多馬來文的元素。<sup>⑤</sup>除了福建話之外，周凱琴的研究也指出現今所流行的馬來西亞華語也延續了這種馬來話滲透的現象。<sup>⑥</sup>顯見19世紀東南亞社會與當今社會的傳承性，因此具有很高的討論價值。

除了語言之外，具有語言文字內涵的地名，亦是華人與在地其它文化接觸之後的產物之一。地名是人們對於土地認知、情感和記憶的載體，人們會藉由對地理空間的命名來詮釋對地方的想像以及他們的所見，為人們環境識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的一部份，因此地名不僅僅是實體空間的標籤，而且代表了具有實質社會意義的「地方」(*place*)。<sup>⑦</sup>

自明清時期以來，中國華南與東南亞的往來密切，不少華人也寓居(*sojourn*)於東南亞，19世紀初開始，更有大量的華人定居於東南亞，他們當時所在的東南亞並非中國傳統的漢文化圈，而是進入到歐洲殖民勢力以及當地南島民族政權所主導的場域，因此他們無可避免地需要對現有的環境重新詮釋，建立起一套對當地認知的地理知識。而這套新的地理知識並非單純由華人既有的漢文化完全轉移，而是在漢文化的基礎下，與當地土著及歐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互動下所建立，成為一套具有南洋色彩的地理知識體系。

是故，本研究將透過文字化的地名作為媒介，討論華人如何使用本身的語言文字重新詮釋新的環境，同時將之內化成為東南亞華人的地名用語？這些語言文字如何在當時逐步標準化，形成現今所看到的地名？藉此了解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東南亞華人地理知識的形構。

本研究將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新加坡所發行的《叻報》作為主要語料來源，蒐集並討論1887年至1932年期間所出現的地名。

## 一、資料介紹：《叻報》

《叻報》於1881年由馬六甲土生華人薛有禮在新加坡創辦。薛氏是福建漳州移居南洋的第五代華人，其家族是馬六甲及新加坡一帶著名的貿易商，為地方巨富。其父薛榮樾移居新加坡後，與其他華商共同創立當地最早的學

⑤ 洪麗芬、羅榮強，〈閩南語和馬來語的詞匯互借現象〉，《閩商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頁19-29。

⑥ 周凱琴，《馬來西亞漢語和馬來語借詞相互滲透之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雙學位未刊碩士論文，2010）。

⑦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校——萃英書院。薛有禮本身曾受英文教育，後來被送回中國生活及學習中文，1877年匯豐銀行在新加坡設立分行之後，薛有禮任職於匯豐，擔任買辦，<sup>⑧</sup>一直到創辦《叻報》時，仍兼任匯豐買辦。<sup>⑨</sup>

至於薛有禮辦報的動機，有學者認為或許出自新加坡民智蔽塞，同時也與正面回應清廷領事的倡議有關。<sup>⑩</sup>但無論如何，薛有禮的個人經歷以及作為社會領導階層的家族背景，薛有禮個人對服務僑民、傳承文化的使命感，或許也是其中的動機。<sup>⑪</sup>

在運營上，薛有禮邀請中國文人南來擔任主筆。如第一位主筆葉季允曾任職於《香港中外日報》，是擁有辦報經驗的文人。至於主筆底下的《叻報》記者，由於記錄甚少，報導及言論又大多沒有標示姓名，我們難以獲知他們的背景，不過根據同一時期（1922-1941）所出版的五冊《南洋名人集傳》，除了一些由中國南來後便入職報社的讀書人之外，當中有記者身份的名人都是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商人、書記、文員、醫生或校長，有的還是地方領袖，他們在地方上同時也被新加坡的報社委任為駐地記者，為新加坡提供新聞消息。<sup>⑫</sup>筆者相信《叻報》在其他外地新聞的獲取方面，也採取同樣的模式。因此，這些散佈各地的商人、文人及地方領袖都是南洋地理知識建構及地名標準化的重要參與者。

⑧ 柯木林，〈薛佛記家族對新華社會的貢獻〉，載柯木林、林孝勝編，《新華歷史與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頁103-112。

⑨ 何舒敏，《新加坡最早的華文日報：叻報（1881-1932）》（新加坡：南海編譯所，1978）。

⑩ 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⑪ 《叻報》主筆葉季允於1911年叻報創辦30週年時，曾撰文提及薛有禮的辦報緣起：「本館居停（指創辦人薛有禮），生長炎洲，沉潛學海，曩歸祖國，讀書十年，嘗慨夫叻地同僑，囿於舊俗，身之與國，漠不相關，怒然憂之，遂以覺世牖民，引為己責，念裨風教者莫良於報，於是毅然奮發，獨任其難。」見〈本報出世三十週年紀念序〉，《叻報》，1911年12月11日，版1。

⑫ 林夢梅是芙蓉的商人、醫生、文人、地方領袖，後為新加坡《新國民日報》、《總匯新報》，以及吉隆坡《新益群報》的駐地記者（吳亞農編，《南洋名人集傳》，點石齋印刷有限公司，1924，第5冊，頁368）；新加坡的林茫予（商人、校長）也任怡保《中華晨報》駐新加坡記者（《南洋名人集傳》，第4冊，頁153-154）；劉懷光南來柔佛麻坡後在一家店擔任書記，後被新加坡《南洋商報》委任為記者（《南洋名人集傳》，第4冊，頁45）；羅信爾南來柔佛文律從商，具有學識，後被新加坡《南洋商報》和《新國民日報》委任為文律特派記者（《南洋名人集傳》，第5冊，頁191）；王敬文南來新加坡商行擔任文員，後任《新國民日報》記者（《南洋名人集傳》，第5冊，頁175）。

在受眾方面，《叻報》在創辦之初，發行量不大，所針對的群體主要是上層階級的資本家、廠主、店東。《叻報》的收益主要來自廣告，它的廣告客戶主要來自歐洲商行以及殖民政府，廣告內容主要是一些機械、香水、洋酒等高價值商品，政府餉碼告示、店家公告也是廣告重要的組成內容。

到了20世紀以後，《叻報》逐漸普及，銷量漸增，<sup>⑬</sup> 它的廣告內容也出現大眾化的趨勢，幾乎每頁都可以見到藥品、香煙、煤油等日用品的廣告，比例相當高。到了1920年代，出現文藝專欄、學校招生廣告、慈善籌款、學校籌款廣告，可見報章已經成為社會大眾獲取重要資訊和知識的主要來源。由於《叻報》以新加坡為基地，其所報導的新聞、廣告來源都與新加坡有關，因此它的讀者群還是以新加坡讀者為大宗。

總體而言，《叻報》是馬新地區最早的中文日報，它在當時也是少有的中文大眾傳播媒介，對於東南亞在地文字、語詞的形成與普及化，扮演重要的角色。《叻報》所含資訊眾多，是人文社會學科相關研究的重要材料，因而也成為許多研究者的研究對象，不過迄今為止，以《叻報》為研究的議題主要集中於語言學及歷史學，<sup>⑭</sup> 地理及地名學相關的討論較少。

在地名研究的價值上，《叻報》以新加坡為基地，亦銷至馬來亞甚至東南亞各地。<sup>⑮</sup> 由於銷售範圍大，因此所連結的地理區相當廣，在新聞中會報導新加坡、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群島、東南亞其他地區，以至中國及世界的新聞。除了各地新聞之外，上述所提及的商家廣告，<sup>⑯</sup> 以及各地政府的告示，<sup>⑰</sup> 這些內容所出現的地名眾多，與《公案簿》和青雲亭史料等專於紀錄地方社會事務、流通於少數社會領導階層的文獻有很大的不同。

在時間斷面上，《叻報》於1880至1930年代發行，不僅是本地區橫跨時間段最長的報紙，這段期間也正是華人在馬來半島及南洋各地的大開發時間，許多的地方陸續被開發，一些原有的馬來及歐洲地名也開始在這段時間被華人接觸，進而開始創造新的地名，建立新的地理知識，許多現今為人熟知的地名，在當時都還處於創造與標準化的過程中。

⑬ 衣若芬，〈吸煙與愛國：「五四運動」前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新加坡《叻報》的廣告〉，《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54卷，第2期（2009年9月），頁65-106。

⑭ 邱克威，〈《叻報》記時詞語特點考察略記〉，《語文建設通訊》，第112期（2016年9月），頁1-8。

⑮ 柯木林、林孝勝，《新華歷史與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頁125-135。

⑯ 廣告當中的商號各地分行、商品銷售地經常出現地名。

⑰ 例如經常能夠看到來自荷屬東印度群島、婆羅洲，以及馬來亞政府所刊登的公告。

無可否認，華人對於東南亞的地理知識並非全然在《叻報》創辦之後才出現，在這之前的華人也已經有了許多用以表達其他文化事物的外來語詞，<sup>⑱</sup> 因此這份文獻的價值不在於它詞彙上的創新性，而是將華人長時間的在地知識累積，每天透過大眾傳播方式加以普及化，加強及鞏固一套屬於南洋在地的知識體系。

《叻報》所記載的地名種類繁多，有不同層級、語言以及命名來源，本研究參考康培德對於巴達維亞《公案簿》當中語詞的分類，<sup>⑲</sup> 從語言詞素組成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地名。從詞素組成來看，所蒐集到的地名可分為三大類，即：華人的固有詞(Chinese lexicon)、音譯詞(phonemic loan)以及音譯詞與固有詞並用的複合詞(compound word)，分析的對象除了地名專名之外，也會論及地名當中的通名。從此分類架構，以期具象化地呈現華人對於漢文化和其他南島民族、歐洲文化交流下所做出的回應。

## 二、華人地名的類型與特徵

### (一) 固有詞地名

固有詞地名是純粹使用華人原鄉就已經有的語詞，在使用上主要以意譯的方式來詮釋外來語地名，或是直接對一地重新命名。

以意譯方式詮釋的地名方面，新加坡的 Government Hill 便是其中一例，當地是殖民政府行政首長的官邸的所在，因此該區山腳一帶又稱為「王家山腳」<sup>⑳</sup> (*ong-ke-suan kha/wong-ka shan keuk*)<sup>㉑</sup>，華人把傳統中國對於「王」

⑱ 例如18世紀至19世紀荷印巴達維亞華人所留下的《公案簿》、馬六甲青雲亭的《呷國青雲亭條規簿》，以及許多廟宇碑文等都能夠看到當時華人用以詮釋本地事物的語詞。此外，根據莊欽永、周清海的研究，19世紀初在本地活動的傳教士也創造了許多漢字詞彙。見莊欽永、周清海，〈十九世紀上半葉基督新教傳教士在漢語詞彙史上之地位——以郭實獵中文譯著中之舊語新詞為例〉，《或問》，第17號（2009年），頁1-20。

⑲ 康培德認為《公案簿》當中的語詞為「無音譯借詞的語詞」、「音譯借詞與非音譯借詞並用」。見康培德，〈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頁1-20。

⑳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6。本研究中所引用的《叻報》頁數均為新加坡大學圖書館數位化《叻報》之 pdf 文檔頁數。

㉑ Firmstone, H. W.,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2 (1905): 124-125.

的概念應用在南洋的殖民政府上。<sup>22</sup> 其實早在1787年的巴達維亞公案簿上，當地華人便已經以「王上」(*ông-siông*)指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sup>23</sup> 相對於以固有詞重新命名的地名，這種意譯的地名較少。

將地名重新命名的情況主要出現在該地已有其他族群的地名，但是並不為華人所使用，反而在當地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命名系統，這種情況的固有詞地名最多，如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在19世紀初所規劃的 South Bridge Road，華人稱之為「大馬路」(*tōa-bé-lō*)。<sup>24</sup> 新加坡的 Pekin Street，當時華人並不將之直譯為北京街，而稱「衣箱街」<sup>25</sup> (*i-sio<sup>n</sup>-koi/yi seung kai*)<sup>26</sup>。Telok Ayer Street 除了直落亞逸街之外，在報章上也被記為「源順街」(*goân-sūn-ke*)。<sup>27</sup> 除了線狀街道之外，像是一些面狀的地區也有這種現象，例如新加坡的馬來語地名 Kandang Kerbau (牛欄)，也被華人稱為「竹腳」<sup>28</sup> (*tek-kha*)，新加坡南岸地區由於商業較為繁榮，因此被稱為「大坡」<sup>29</sup> (*tōa-po*)。新加坡 Hill Street、High Street、North Bridge Road 靠河一帶的地區又作「水仙門」<sup>30</sup> (*chui-sien-mng*)。<sup>31</sup> 前述地名已完全是另一套命名系統。此一現象多少反映

<sup>22</sup> 在傳統漢人的哲學觀當中，唯有華夷共主的中國皇帝可使用「皇」字，其他被視為朝貢國的歐洲國家、東南亞各藩屬國的統治者只能以「王」字稱之。見莊欽永、周清海，〈翻譯的政治：「皇」、「王」之論爭〉，《或問》，第18號（2010年），頁85-125。

<sup>23</sup> 包樂史 (Leonard Blussé)、吳鳳斌校註，《公案簿·第1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頁375。

<sup>24</sup>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7。

<sup>25</sup> 衣箱街一詞出現在店舖出租的告示當中，見《叻報》1932年1月4日，版7。衣箱街的稱法最早何時出現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1891年的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期刊的新加坡街道名錄的中英對照當中已經出現。見 Haughton. H. T, "Native Names of Street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1891): 49-65。1930年代之後，則開始在一些資料上看到 Pekin 翻譯為北京街。見潘醒農編，《新嘉坡華僑社團學校通信錄》(新加坡：南島出版社，1947)，頁50。北京街開始為人所使用、與衣箱街並存的稱法，或許與當地的產業變遷有關，當該處的產業特色消失時，衣箱街也逐漸少人使用。

<sup>26</sup> 這裡的拼音是根據 Firmstone 於1908年所作的街名記音，見 H. W. Firmston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2 (1905): 120-121。

<sup>27</sup> 《叻報》，1888年4月2日，版1。

<sup>28</sup>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14。

<sup>29</sup> 《叻報》，1888年6月1日，版6。

<sup>30</sup> 《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1。

<sup>31</sup> Firmstone 並沒有記錄廣東音。H. W. Firmston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114-115.

不同族群對於同一地方或地標有着不同的視角，同樣地，這些地方或地標對不同群體而言，也有着不同的意義。

這些固有詞地名除了《叻報》之外，也常見於其他的地名材料，像是一些舊的中文地圖（見附錄1），當中便能找到例如森美蘭的「七條石」、吉隆坡的「三個石」，這是華人對於道路里程碑的指稱。還有吉隆坡郊區以自然環境命名的「石山」。透過不同地名材料的比較，多少也顯示了《叻報》地名用作解釋新馬華人在地名詮釋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上述使用固有詞的地名在空間分佈上最常出現於華人聚居的市街聚落內部，因此可以看到這些地名的屬性多是街道名、地標名，空間的尺度一般較小，都是與華人生活息息相關、經常接觸的空間。

此外，也有少部份的固有詞地名指稱的空間層級較高，是一整個聚落或地區。例如一些由華人所開發的地方，先前並沒有其他的聚落或地名存在，因而由華人命名，例如柔佛的永平，<sup>②</sup> 先前是華人所開發，是以胡椒、甘蜜種植為主的華人聚落，因而以華人固有詞命名。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也是如此，<sup>③</sup> 當地是一個華人所開發的礦區。另一些高層級的地方，例如一些古時候與中國有密切貿易往來關係的地方，例如蘇門答臘的 **Pelembang**，它對應為「巨港」<sup>④</sup> (*kū-kāng*)，它在明朝鄭和航海圖當中便已出現，<sup>⑤</sup> 沿用至今。

總體而言，這些華人固有詞地名為華人所創造及使用，並不為其他族群所熟知，因此在東南亞華人地名當中，所佔的比例不多。它們主要分佈在華人聚集的市鎮以及華人所開發的地區，地名隨着華人的移入而出現。由於這

② 《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10。永平地名現在依然為人使用，馬來文地圖及 google map 上也寫作 Yong Peng，永平聚落最早是因為19世紀胡椒、甘蜜的種植而興起的港腳 (*kangkar*) 聚落，因此早期又稱為永平港。該港腳相傳是有潮州籍的巫許亞魯。至於「永平」一名的由來，我們不得而知，但相信取自吉言佳字。見南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中心，《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資料彙編》（新山：南方學院，2003）。

③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5。山口洋的地名由來與當地的地形有關，當地三面環山一面開口向海，故名。見利亮時，〈走過移民崎嶇路的社團：曼谷客家總會與山口洋地區鄉親會之比較〉，載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2013），頁104。

④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5。

⑤ 鄭和航海圖作「舊港」，福建話的音同「巨港」。見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北京：中華書局，2000）。



些華人為主的地區當中，華人的口語規模已經夠大，<sup>36</sup> 使用頻率較高，較不會有跨族群溝通上的問題，因此使用外來語詞地名的需求不大。

## (二) 音譯詞地名

音譯詞地名是指完全使用音譯的方式將外來語（馬來文、英文等）用華人語言所對應的漢字加以詮釋。東南亞華人的音譯地名佔華人創造地名的絕大多數，例如馬來亞霹靂(Perak)的Larut譯作「勝律」(*lâ-lùt*)<sup>37</sup>（見附錄2圖2-2）、Perak本身譯作「白蠟」(*pèh-lâp*)<sup>38</sup>、Larut岸外的港口Port Weld譯作「卜為老」(*poh-ûi-ló*)<sup>39</sup>，雅加達的舊名Kelapa譯作「加勝巴」(*ka-lâ-pa*)<sup>40</sup>、北馬的檳城—Penang譯作「庇能」(*pì-lêng*)<sup>41</sup>等。本研究蒐集到的外來語地名幾乎都是用福建話記音，雖然馬新地區的華人來自不同的方言群，但是以廣府話和客家話等其他語言記音的地名較少。受限於福建話的發音系統，它無法完全精準地與外來字對應，因此便以發音相近的漢字來表示，例如「蠟」對應rak、「卜」對應port、「能」對應nang，等等，形成我們所看到的地名。

此外，由於南洋的馬來或英語地名音節不多，一些常用的音節也開始出現其固定對應的漢字。例如ba對應為峇(*bâ*)，如峇眼<sup>42</sup> (Bagan)；la/ra對應為勝(*lâ*)，如勝律(Larut)、lang/rang對應為壟(*lâng*)，如三寶壟或三寶壟<sup>43</sup> (Semarang)；a對應為亞及阿(*a*)，如阿力山大<sup>44</sup> (Alexandra)；bu對應為武(*bú*)，如武吉巴梭<sup>45</sup> (Bukit Pasoh)；nut/rut/road對應為律(*lùt*)，如文律<sup>46</sup>

<sup>36</sup> 例如在1881年，新加坡華人的口語比例佔62%，而馬來人僅佔24%。見 E. M. Merewether,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aken on the 5th April 189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46。

<sup>37</sup> 《叻報》，1891年5月3日，版2。此外，在1894年拿律當地福建社群建立的義山（墳地）「募建冢亭小引」的碑文當中，也見到「勝律」的寫法，見附錄2圖2-2。

<sup>38</sup> 《叻報》，1888年3月2日，版8；《叻報》，1897年1月24日，版2。

<sup>39</sup> 《叻報》，1891年5月14日，版6。

<sup>40</sup> 《叻報》，1897年1月3日，版6。

<sup>41</sup>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2。

<sup>42</sup> 《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13。

<sup>43</sup>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3；《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13。

<sup>44</sup> 《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4。

<sup>45</sup> 《叻報》，1888年4月2日，版2。

<sup>46</sup>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5。

(Benut)、勝律(Larut)、美芝律<sup>④⑦</sup> (Beach Road)；tan/dan 對應為丹(*tan*)，如關丹<sup>④⑧</sup> (Kuantan)、美丹<sup>④⑨</sup> (Medan)；lan/dan 對應為蘭(*lân*)，如森美蘭<sup>⑤⑩</sup> (Negeri Sembilan)以及棉蘭<sup>⑤⑪</sup> (Medan)；ka/ga 對應為加(*ka*)，如丁加勞<sup>⑤⑫</sup> (Terengganu)；pa 或部份的 ba 對應為巴(*pa*)，如丹戎巴葛<sup>⑤⑬</sup> (Tanjung Pagar)。上述福建話發音的漢字逐漸成為南洋地名的常用漢字，許多也一直被沿用至今。

《叻報》當中也可找到少部份以廣府和客家話發音的地名漢字，例如馬來亞森美蘭的 Menanti 譯作客家話發音的「民難知」<sup>⑤⑭</sup> (*min<sup>55</sup>-nan<sup>33</sup>-di<sup>53</sup>*)<sup>⑤⑮</sup>，霹靂怡保的舊地名 Paloh 則譯作廣府話發音的「埧羅」<sup>⑤⑯</sup> (*baa<sup>3</sup>-lo<sup>4</sup>*)<sup>⑤⑰</sup>，這兩個地方都是以客家和廣府人人口佔優勢的地區，福建人較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地區雖然是以廣府和客家人為優勢，但譯寫方式仍然是以福建話為媒介。例如 Selangor，華人譯作「雪蘭莪」(*she-lân-gô*)、實蘭莪(*sit-lân-gô*)。Sarawak 則作「實勝越」(*sit-lâ-oàt*)、「砂勝越」(*sa-lâ-oàt*)，當地廣府人和客家人也使用本身的語言來詮釋這一福建話的文字，成為廣府話的 *syut<sup>3</sup>-laan<sup>4</sup>-ngo<sup>4</sup>*、*saa<sup>1</sup>-lou<sup>4</sup>-jyut<sup>6</sup>*，以及客家話的 *sied<sup>5</sup>-lan<sup>55</sup>-ngo<sup>55</sup>*、*sa<sup>53</sup>-lo<sup>55</sup>-rhad<sup>2</sup>*。

福建話的優勢地位除了與其人口優勢有關之外，更加與族群經濟的地理空間分佈有關。在馬來亞佔有人口及經濟優勢的福建人大多聚集在以轉口貿易為主的海峽殖民地，這裡也因為商業發達，而成為各種文化、出版品的輸出基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馬新地區的報章幾乎都設置在新加坡和檳城，

④⑦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7。

④⑧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5。

④⑨ 《叻報》，1891年8月12日，版6。

⑤⑩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5。

⑤⑪ 《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10。

⑤⑫ 《叻報》，1891年2月23日，版2。

⑤⑬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4。

⑤⑭ 《叻報》，1891年6月26日，版6。

⑤⑮ 客家話的發音的標示是以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的海陸音為依據。海陸音在馬來亞客家語群中相當普遍。見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⑤⑯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4。在怡保的埧羅古廟至今還沿用這個傳統的「埧羅」地名，廟裡一些19世紀的法器也能見到「埧羅」的字眼，見附錄2圖2-6。

⑤⑰ 廣府話發音的標示是以香港中文大學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所提供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注音系統為準則，其音標是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能與文中的福建話白話字拼音作區隔。見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

例如新加坡的《叻報》、《日新報》、《中興日報》、《振南日報》、《國民日報》、《新國民日報》、《星報》、《天南新報》、《總匯新報》、《星洲晨報》，以及檳城的《檳城新報》、《光華日報》。這些位在福建人為首的市鎮的大眾傳播媒介使得福建話在地名命名上佔有主導權，成為華人地理知識建構的重要語言。此外，在現今馬來西亞流行以華語為媒介語之後，這些19世紀被文字化的地名也被人們用華語（普通話）再次詮釋，成為 *xuǒ lán é* 和 *shā láo yuè*，經多次詮釋之後，人們已經難以就華語發音來對應原有的外來語。

總體而言，音譯詞地名在各種地名分類中所佔的比例最高，這個現象在1930年代的中文舊地圖當中亦充份顯示（見附錄1），音譯詞地名對於華人地理知識的構成扮演重要角色。音譯詞地名除了會出現在小尺度的空間之外，與固有詞地名稍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使用在空間範圍較大、等級較高地方，例如港口、城鎮、地區的名字。此一現象的出現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華人遇到的許多地名，在東南亞早已經廣為其他族群所使用，在尚未對該地有進一步的詮釋之前，便直接音譯這些外來語的地名。其二，這些地方主要是馬來人等其他族群的生活領域，與華人關係較疏離。其三，在華人處於非主流的大環境中，牽涉到與其他族群的商業往來及殖民政府交流時，便必須使用音譯詞，以融入多元族群的社會，並且加強地名的實用性。其四，在殖民地當中，政府對於市鎮和轄區的管理程度相當細緻，政府因為產權登記、郵電交通、地圖繪製等的需求，而對地方有着一套官定的標準化地名，在此情況下，華人在地名命名時，也會以此為參考，因此官方地名對於華人地名的詮釋有直接的影響。

### （三）複合詞地名

複合詞地名結合音譯詞和固有詞的元素，主要是由一個專名及一個通名組合而成。其固有詞多為通名，主要是用以加強說明以及修飾其專名——音譯地名，這些固有詞具有以下幾種類型：

其一是表示該音譯地名的性質，例如京、街、坊、城、坡等，表示首都、街道、街道間的坊、城鎮<sup>58</sup>等。在華人觀念中，「京」指的是國都，傳統上指稱北京時，會以「京」表示，因此京的觀念也用以指稱其他國家的首

<sup>58</sup> 城、坡皆是城鎮的指稱。

都，例如可以見到「暹京」<sup>⑤⑨</sup> (*siām kia<sup>n</sup>*) 表示暹羅(Siam)的首都，指稱倫敦時會稱之為「英京」<sup>⑥⑩</sup> (*eng kia<sup>n</sup>*)，挪威的奧士陸為「挪京」<sup>⑥⑪</sup> (*nô kia<sup>n</sup>*) 等等。一些殖民地的地名例如 Raffles Place 的 Place 會以中國傳統聚落底下的單位「坊」來表示，加上音譯詞 Raffles 複合成為「萊佛士坊」<sup>⑥⑫</sup> (*lâi-pùt-sū hong*)。

其二是表示地名所在的位置，例如北、口、旁、尾、邊等，這些都是華人固有的位置名詞，放在地名前面或後面作為修飾用途或加強說明，例如 North Boreno 作北慕娘<sup>⑥⑬</sup> (*pak bō-niū*)，其他一些地名則與外來語地標名配合方位使用，如：舊巴虱口<sup>⑥⑭</sup> (*kū pa-sat kháu*)、土庫前海傍<sup>⑥⑮</sup> (*thó-khò`chêng hái pāng*)、直落亞逸尾(*tèk-lòk-a-èk bóe*)、土庫花園邊<sup>⑥⑯</sup> (*thó-khò`hoe-hng pi<sup>n</sup>*)。

其三是表示地名的階序，常見的是以大、小等形容詞放在地名前面，它們有的來自意譯，有的則是華人用既有的外來語詞，加上自己的空間認知而出現。前者例如馬來亞柔佛的 Pontian Besar 和 Pontian Kecil，besar 和 kecil 分別為馬來語的大、小之意，因而作大笨珍(*tōa pūn-tin*)、小笨珍<sup>⑥⑰</sup> (*sòe pūn-tin*)，此地名也被沿用至今（見附錄2圖2-4）。菲律賓的 Manila（馬尼拉）則稱小呂宋<sup>⑥⑱</sup> (*sòe lú-sòng*)。

總體而言，這些複合詞地名的使用包含大尺度以及小尺度的空間，透過本身的固有詞與外來語詞的合併使用，華人得以在接觸各種外來語地名時，將這些原來在本身語言概念中沒有意義的外來語詞，賦予各種屬性的詮釋，使得在與其他族群和殖民政府互動時，能夠便於使用，同時也便於自身理解。

⑤⑨ 《叻報》，1888年3月2日，版2；《叻報》，1932年1月4日，版13。

⑥⑩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2；《叻報》，1932年1月4日，版14。

⑥⑪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11。

⑥⑫ 《叻報》，1932年1月4日，版7。

⑥⑬ 《叻報》，1891年1月1日，版1。

⑥⑭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1。

⑥⑮ 《叻報》，1888年6月1日，版6。

⑥⑯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7。

⑥⑰ 《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4、10。

⑥⑱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7。

### 三、地名詮釋以及意義的賦予

上述固有詞、音譯詞以及複合詞地名的使用，三者其實都牽涉華人對於地名或是地理環境的重新詮釋以及創新。

固有詞地名牽涉華人對當地的想像與詮釋。以新加坡的「水仙門」為例，他的出現便與當地外來語地名無關，是華人重新詮釋的結果。據新加坡文史工作者吳慶輝的考證，當地正是人們最早上岸的地點，該地名推測來自中國泉州港口的水仙門，由於機能相同，因而命名。<sup>⑨</sup> 早期華人也經常以當地的實際特徵來為地方命名，例如大馬路，由於該路段位在當時的市中心，也是市區的主要幹道，因而稱之。衣箱街則推測與該街的零售產業有關，因而作為 *Pekin Street* 的指稱，為全新的命名系統。

除了固有詞之外，看似模仿外來語的音譯詞在展現華人對於新環境的詮釋方面，亦不容忽視。音譯詞地名並不是單純地將外來語地名直接移植使用、以外來語發音，而是透過華人的語言系統重新詮釋，正如翻譯學學者所說，譯詞的產生並不僅是源語(*source language*)往譯體語(*target language*)轉換的結果，更是各種語言文化接觸、交融的結晶。<sup>⑩</sup> 特別是在19世紀，東南亞絕大部份的華人都不能諳英語和馬來語，因此需要借助漢字來詮釋外來語。例如在光緒九年(1883)於新加坡出版的馬來語、英語字典《華夷通語》當中，所有的外來語便未出現羅馬字，而是以福建話的漢字表現，例如「雪」對應為「獅二」(*sai-nò*)，<sup>⑪</sup> 以和 *snow* 對音。雖然以「西二」(*si-nò*)來詮釋的話，讀音會更加接近，但相信是為了讓讀者更容易吸收，因此使用了「獅」的意象。在廣府民間的農民曆——《通勝》當中也可見到類似的情況。在現今香港永經堂所出版的《通勝》，仍保留過去轉載清代《華英通語》的傳統，可以見到以粵語的常見字「溫」(*wan<sup>1</sup>*)表示英文的 *one*，用「衣拉焚」(*ji<sup>1</sup> laa<sup>1</sup> fan<sup>4</sup>*)表示英文的 *eleven*。<sup>⑫</sup> (見附圖1) 故在音譯以及漢字化的過程

⑨ 吳慶輝，〈新加坡「水仙門」的由來〉，2009年，<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903>。

⑩ Lydia He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⑪ 文中特別標示在唸「獅」字時，需要以舌音唸。

⑫ 香港永經堂出版的《通勝》過去都有附上華英通語的日常語詞，惟近幾年有暫停轉載，但在2020年版的《通勝》又可見華英通語的中英文詞對照。感謝「程尋香港」主持人溫子祺先生提供資料。

中，華人不見得了解外來語地名的原意，會以各種脫離原意的圖像來詮釋，而衍伸出其他的意義。

從上可知，華人在東南亞與其他文化接觸之後，對於當地地理空間的詮釋結果有以下兩種情形：其一，是脫離音譯詞原來的意義，成為具有其他意義的新地名。其二，有的雖然保留音譯名詞，但這些音譯名詞卻逐漸取代華人原鄉舊有的固有詞，重新形構與內化成為華人在地的地理知識。

### （一）從詮釋到新意義的賦予

在第一種情形當中，一些比較常用到的地名，特別是一些華人聚集的大城，在從外來語重新詮釋成為漢字化地名之後，其地名的音譯文字也會逐漸減少，而取一個經過普遍使用後最能代表該地且不會造成混淆的文字來作為地方的指稱，例如 Malacca，華人將之詮釋為麻六甲 (*môa-lâk-kah*) 或馬六甲 (*má-lâk-kah*)，在華人長久使用以及報章寫法的推波助瀾下，逐漸簡化為「甲」(*kah/kap*)，因此在南洋語境中的「甲」除了表示「甲乙丙丁」的秩序之外，也延伸出「麻六甲」這一地名意涵（見附錄2圖2-1）。在新加坡，原本音譯的地名 Selat，先是被詮釋為「石叻」，最後被簡化為「叻」(*lât*)，例如「叻地近來有癩狗傷人之事」<sup>⑬</sup>、「上好萬蘭池酒來叻發售」<sup>⑭</sup>等。《叻報》當中的「叻」便是以此簡化地名為名的報章。另一華人大城檳城也有此情況，將原有的 Penang 以「檳」(*pin*)表示。這些可被簡化的音譯地名不多，只有廣為人知的地名才有此現象。

另一些音譯地名簡化脫離原有的記音屬性之後，也會加上其他的固有詞，以複合詞的形式出現，成為新創的地名，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星加坡被簡化，增加「州」字成為「星州」<sup>⑮</sup>，指涉新加坡，在之後的日子裡，「星」便多了一層意義，即作為「新加坡」的代稱。此外，《叻報》也曾出現將「石叻」與「新加坡」合併詮釋的表現方式，成為「叻加坡」(*lât-ka-pha*)。<sup>⑯</sup>同一時期的檳榔嶼被簡化之後成為「檳」，再配上標示屬性的「城」字成為「檳城」<sup>⑰</sup> (*pin-siâ*)。

⑬ 見《叻報》，1891年9月4日，版6。

⑭ 見《叻報》，1894年4月21日，版8。

⑮ 見《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10；《叻報》，1932年1月4日，版7。

⑯ 見《叻報》，1928年3月16日，版19。

⑰ 見《叻報》，1932年1月4日，版2。

## (二) 從外來語的詮釋到內化

在華人對常用外來語內化的情形中，特別是一些地名通名，例如某某「山」、某某「路」、某某「角」等，由於出現頻率較高，久而久之成為華人的慣用語。例如海岸地形——岬角在海上易於辨認，進而成為重要地標，因此馬新沿海地區經常出現 *tanjung*（岬角／海角）的地名。對此，華人已經慣稱「丹絨」（*tan-jīōng*），例如 *Tanjung Dato* 作「丹戎勝卓」<sup>78</sup>、*Tanjung Katong* 作「丹容加東」<sup>79</sup>、*Tanjung Pagar* 作「丹戎巴葛」<sup>80</sup>。Teluk（海灣）慣稱「直落」（*tèk-lòk*），<sup>81</sup> 而非「灣」。Bukit（地勢不高的山）慣稱「武吉」（*bú-kiat*）。<sup>82</sup> 河口或河流交會處（Kuala）慣稱「掛勝」（*kò-a-lâ*）。<sup>83</sup> 這些通名都已內化成為華人碰到地名通名或是指稱時，經常使用的語詞，反而較少以原鄉常見的固有詞「角」、「灣」、「山」、「口」等作為替代。

此外，在市區當中所出現的街路通名也有使用上內化的現象。例如遇到殖民政府所規劃的 *Road*（路）時，華人並沒有使用原鄉既有的固有詞——「路」（*lō*）來表示，反而固定使用音譯詞「律」（*lüt*）。「律」是華人在本地重要的創新詞，雖然在華人傳統觀念當中也有「路」的指稱，泛指「道路」，特別是一些連接不同地方之間的幹道，但「路」卻鮮少出現在城鎮當中作為通名使用，翻看清代中國的城鎮研究和地圖，無論是在臺灣或是大陸的城鎮皆是如此，城內最常見的是「街」和「巷」。<sup>84</sup>

反觀在英殖民地政府所規劃的街道中，*road* 是殖民市街聚落中常見的規劃，它與 *street*、*lane* 一樣具有等級概念。或許是早期華人未能把原鄉的「路」

<sup>78</sup> 見《叻報》，1888年3月1日，版4。

<sup>79</sup> 見《叻報》，1931年4月10日，版13。

<sup>80</sup> 見《叻報》，1932年1月4日，版4。

<sup>81</sup> 例如霹靂的直落安申（Teluk Anson），見《叻報》，1891年8月15日，版6。

<sup>82</sup> 例如新加坡的武吉智馬（Bukit Timah），見《叻報》，1891年2月24日，版2。

<sup>83</sup> 例如霹靂的掛勝港沙（Kuala Kangsar），見《叻報》，1891年5月22日，版2。

<sup>84</sup> 中國傳統市街內部一般以街、巷為單位。例如在清代的艋舺市街，當中的道路名稱都以街、巷為單位，並未出現「路」，清代的臺南府城亦然。見黃淑清編，《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頁36-46；黃雯娟，〈命名的規範：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156-157。除了清代臺灣之外，在同時期的內地也是如此，可參見美國國會圖書館藏1881年《浙江寧波府城圖》、1864年《武漢城鎮合圖》、1877年《湖北漢口街道圖》、1867年《浙江省垣坊巷全圖》，澳洲國家圖書館藏1860年《廣州城郊圖》（*Map of the city and entire suburbs of Canton*）。

與殖民地的 road 對應，<sup>85</sup> 因此使用了外來詞。此一現象可以從 H. W. Firmstone 於1905年記載的新加坡街名表得到證實，遇到 road 時，華人多以地標來表示，例如 Beach Road 便作小坡海墘、金榜海邊、鐵巴虱口等地標名。<sup>86</sup> 在直譯地址時，則可以見到華人以另一個音譯名詞——「律」來指稱都市聚落中的「road」，例如 Craig Road 和 Muar Road 會被譯為加力律(*ka-làt lùt*)<sup>87</sup> 以及麻律(*môa lùt*)。<sup>88</sup> 若留意戰前華人民間的一些田野材料，也能普遍見到「律」的使用（見附錄2圖2-3）。

此外，一些重要的交叉路口或是要道，也會從單純的路名升級成為地方名，在早年的馬來半島中文地圖中（附錄1），便可以見到雪邦律（Sepang Road，森美蘭境內）、峇都律（Batu Road，吉隆坡境內）和打巴律（Tapah Road，霹靂境內）。

隨着華人對殖民地環境的融入，「律」的使用逐漸普及，這種現象除了常見於《叻報》之外，華人的會館特刊、商業年鑑<sup>89</sup> 在書寫路名時，也經常出現「律」的用法。例如在1958年新加坡茶陽會館的百年紀念特刊當中，會員商號地址的總表遇到 road 時，也都是以「律」來表示。<sup>90</sup>

另一個通名是 Street（街），除了固有的「街」之外，華人也開始以「實得力」（*sit-tek-làt*）來表示，取代「街」的用法。據觀察，「實得力」和「街」的使用差異在於英文地址和地方俗稱的使用，「實得力」經常出現在地址的用詞當中，特別是一些廣告以及商業聲明，例如在1895年的一則商號承頂聲明當中，商家在表示正式的店址所在地時，便使用實得力：「啟者舊巴虱絲絲實得力第十四號門牌福安號」。<sup>91</sup> 此外，《叻報》舊址 Malacca Street 在該報地址版面長久以來便是以「舊巴虱口」表示，直到1902年10月27日遷址 Cross Street 之後，才改以「實得力」表示地址，作為街的替代，為「哥勞實得力」（*ko-lô sit-tek-làt*）。事實上，實得力並非《叻報》率先使用，

<sup>85</sup> 「路」在民國時期才開始在中國各地城市變得普及。

<sup>86</sup> H. W. Firmston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62-63.

<sup>87</sup> H. W. Firmston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82-83.

<sup>88</sup> H. W. Firmston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110-111.

<sup>89</sup> 如1939年新加坡《南洋商報》所出版的《南洋年鑑》。

<sup>90</sup> 在客家話中，律的發音與福建話相同。

<sup>91</sup> 《叻報》，1895年3月9日，版6。



新加坡另一份報紙《天南新報》在1898年創刊時，其館址便已經使用「寔得力」(*sī-tek-làt*)作為「街」的替代詞，為「英領新加坡北京寔得力」(*Pekin Street*)，取代原有的「衣箱街」。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在「北京寔得力」後也加註「即衣箱街」。<sup>92</sup> 此種正式地址加註固有詞地名的形式某程度上反映這一語詞仍在內化的過程中。不過，「實得力」使用的普及率遠不如「律」。

另一方面，一些音譯詞被華人慣用內化之後，也開始出現價值判斷化的現象，例如位在上游的地方，其地名經常會出現 *Ulu* 或 *Hulu* 的通名，華人多作「烏魯」(*u-ló*)，這些上游地區開發較少，商業發達程度並不如華人聚集的下游港市，因此「烏魯」除了作為「上游」的對應之外，也逐漸被華人用作形容落後的代名詞。<sup>93</sup> 另一與 *Ulu* 相同情形的地名通名是 *kampung*，它是馬來語中的「村莊」，而在19世紀時，「甘公」(*kam-kong*)是它經常出現的稱謂，20世紀的《叻報》語料則逐漸定型為「鑑榜」(*kam-póng*)。由於南洋華人多居住於市鎮地區，對於居住在郊區的村莊則多以「鑑榜」稱之。久而久之「鑑榜」也逐漸被內化用以指稱鄉下、家鄉或是開發程度比較低的地區。<sup>94</sup> (見附表1)

#### 四、地名的標準化

在《叻報》所記錄的時間範圍當中，馬新地區許多地方陸續被開發，華人陸續移入，而大批初來乍到的華人也首次接觸新的南洋地理環境。在華人開始大量詮釋及創造地名初期，同一個地點出現不同的詮釋方式，無論是不同的稱呼或譯法，都無時無刻處於變化的過程，然而經過時間的推移，許多地名也開始標準化。

以馬來亞的雪蘭莪<sup>95</sup> (*Selangor*) 為例，華人在19世紀中葉開始陸續進入開發，在初始階段時，人們對地名的詮釋主要是記音，不在乎選用文字的意義，因此相同發音的文字都出現在地名之中，例如在1888年至1930年的《叻報》中，便出現了 *Selangor* 的多種寫法，如實勝俄 (1888年)、實蘭莪

<sup>92</sup> 《天南日報》，1898年5月30日，版1。

<sup>93</sup> 現今，馬新地區華人在形容一地很落後時，會稱這個地方「很 *ulu*」。聽到一些有 *ulu* 的地名時，也會有先入為主的印象。

<sup>94</sup> 今天馬新地區華人在表示回家鄉時，會說「回 *kampung*」；在形容一個地方很鄉下時，會說這個地方「很 *kampung*」。

<sup>95</sup> 今雪蘭莪州。

(1891年)、碩蘭莪(1891年)、實蘭莪(1897年)、實蘭午(1900年)、雪蘭莪(1930年)等六種表示方法，到1930年代才逐漸定型為今天的寫法。<sup>96</sup> 類似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標準化過程中，開始定型的例子還有柔佛的 Batu Pahat，在1888年尚未建市之前，<sup>97</sup> 被寫作峇株峇葛(*bâ-tu-bâ-hat*)，到1931年則看到定型為今天的峇株巴轄(*bâ-tu-pa-hat*)。<sup>98</sup> 東馬的 Sarawak 州，在19世紀末(1888年、1891年)時作實勝越(*sit-lâ-oàt*)，到1932年則出現今天常見的砂勝越(*sa-lâ-oàt*)。<sup>99</sup> 蘇門答臘的 Medan 也從19世紀末的美丹(*bí-tan*)，到1930年代成為今天的棉蘭(*mî-lan*)。<sup>100</sup> 19世紀的北慕娘(*pak bō-niū*)，到了20世紀成為北婆羅(*pak pô-lô*)。<sup>101</sup> 1885年開埠的 Muar 作曼埠(*môa-pō*)，到20世紀則標準化成為今天的麻坡(*môa-pho*)或麻坡(*môa-pho*)。<sup>102</sup>

地名標準化的過程牽涉到人們對環境詮釋與認知的變遷，因此需要經歷一段時間過程。一些大都會，由於人口組成複雜，因而出現各種不同的認知。以新加坡為例，當地在19世紀被廣泛稱為 Selat (馬來名)，<sup>103</sup> 因而被寫作石叻(*sèk-làt*)，到了20世紀，無論是政府或是商人都逐漸較少使用 Selat 來指稱新加坡，因此《叻報》上也逐漸以英文地名 Singapore 的音譯詮釋，因此出現星架坡(*seng-kà-pho/seng<sup>1</sup>-gaa<sup>3</sup>-bo<sup>1</sup>*)、星嘉坡(*seng-ka-pho/seng<sup>1</sup>-gaa<sup>1</sup>-bo<sup>1</sup>*)、星加坡(*seng-ka-pho/seng<sup>1</sup>-gaa<sup>1</sup>-bo<sup>1</sup>*)、新嘉坡(*sin-ka-pho*)的寫法。其他到了20世紀還處於標準化的地名還有 Malaya，在1932年1月4日的報章中同時出現馬來也(*má-lâi-iā*)和馬來亞(*má-lâi-a*)兩種表達方式。

### (一) 地名標準化當中的雅化過程

在標準化的過程中，地名不見得往與外來語讀音趨同的方向發展，相反地，許多純粹記音的地名在此過程中開始出現文字雅化的現象。例如馬來聯

<sup>96</sup>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8；1891年5月7日，版1；1891年5月14日，版6；1897年1月9日，版2；1900年1月19日，版8；1930年4月12日，版21。

<sup>97</sup> 當地在1893至1894年建鎮，此後，華人大量移入。

<sup>98</sup> 《叻報》，1888年6月1日，版7；1931年4月10日，版13。

<sup>99</sup> 《叻報》，1888年3月1日，版4；1891年8月31日，版2；1932年1月4日，版14。砂勝越的地名直到2004年，馬來西亞華文規範理事會才採納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的建議，改為砂拉越，使用至今。

<sup>100</sup> 《叻報》，1888年8月12日，版6；1931年4月10日，版10。

<sup>101</sup> 《叻報》，1891年1月1日，版1；1932年1月4日，版14。

<sup>102</sup> 《叻報》，1891年8月17日，版2；1929年4月18日，版17；1931年4月10日，版13。

<sup>103</sup> 馬來語中的「海峽」。

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首府 Kuala Lumpur，它在19世紀末開始造鎮之初，便出現不同的地名表示方式，在1888年3月1日及2日分別出現「吉隆坡」(*Kiat-liông-pho/gat<sup>1</sup>-lung<sup>4</sup>-bo<sup>1</sup>*)及「柯勝欖保」(*koa-lâ-lâm-pó*)、1891年3月3日出現「柯勝潤勃」(*koa-lâ-lùn-pùt*)的稱法。但是到了20世紀初，後面兩個純粹記音的地名開始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吉隆坡」或「吉隆」。這個表現方式雖然發展得與原文相差甚遠，但可以發現人們取「吉」的寓意以及「坡」的固有詞同時表示其都市的屬性以及記音的功能。類似的例子也出現在 Negeri Sembilan (森美蘭州)。在1891年時，當地作拿吉里士美蘭(*ná-kiat-lí-sū-bí-lân*)，到了20世紀則省略 Negeri，定型為森美蘭(*sim-bí-lân*)，沿用至今。1891年，森美蘭首府 Seremban 出現「沙南班」(*sa<sup>53</sup>-nam<sup>55</sup>-ban<sup>53</sup>*，客家音)以及「芙蓉」(*pu<sup>11</sup>-iung<sup>11</sup>*，客家音)<sup>⑩</sup>兩個用法，<sup>⑪</sup>前者記音，後者則是音譯自 Seremban 的舊地名 Sungai Ujong，並取 Ujong 的對音重新詮釋而來，<sup>⑫</sup>這種用法至少在1860年便已經出現(見附錄2圖2-5)。最後華人卻是以雅化的「芙蓉」作為 Seremban 的指稱。霹靂州的首府 Ipoh 在1880年代開埠之初，在1891年的報章是以「邑坡」(*ip-pho*)表示，到了20世紀則定型為「怡保」(*î-pó/jí<sup>4</sup>-bou<sup>2</sup>*)，<sup>⑬</sup>以相對雅化的名稱沿用至今。

根據上述觀察，地名不斷處於標準化的過程，進入20世紀以後，許多地名雖然仍然是以福建話發音，但是它們開始逐漸定型，成為今天所使用的地理名詞，在此過程中有許多地名是往雅化的方向發展，此一雅化過程相信與當地人士與地方知識分子有關。<sup>⑭</sup>研究認為，當時報章中固定出現的廣告、船班，在地名標準化的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⑩ 這裡以教育部臺灣客家常用語詞典內的四縣音標寫。

⑪ 《叻報》，1891年5月2日，版1；1891年8月10日，版5。

⑫ 因為 Ujong 與客家音的 *pu<sup>11</sup>-iung<sup>11</sup>* 以及廣府話的 *fu<sup>4</sup>-jung<sup>4</sup>*。

⑬ 怡保以廣府人居多，但是廣府人卻未用更加相似的音，例如「怡坡」(*ji<sup>4</sup>-bo<sup>1</sup>*)，來表示 Ipoh 這個地名。

⑭ 由於缺乏史料，因此我們難以掌握地名雅化的詳細過程。但是2005年馬來西亞丁加奴州(Terengganu)易名為登嘉樓的過程，或許能夠提供當時地名雅化的參考。根據2005年4月8日《南洋商報》〈華語規範理事會議決丁加奴改名登嘉樓〉的報導，當地居民及團體多年來使用登嘉樓，然外界則稱當地為丁加奴，並成為主流名詞，因此提出陳情，建議使用當地較正面的漢字翻譯，此獻議被時任新聞部副部長兼華語規範理事會主席拿督林祥才接受，最終使得報章、教科書等逐漸易名。由此觀之，具有地方感的在地人會較重視他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地方，同時一般也會用較具有正面意義的文字來為自己的居住地命名。

## （二）船班、廣告資訊與地名的標準化

由於報章中除了每天出現不一樣的新聞之外，船班和廣告表基本上重復性很高。19世紀至20世紀的東南亞仍屬大航海時代，水陸交通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報章經常會刊登船班資訊。各地的船班除了日期有更新之外，地名的表格基本上維持不變，以《叻報》1887年9月14日的船班表為例，當中便出現東南亞多個港市的名稱，例如泗水、汶島、麻六甲、檳榔嶼、柯勝潤保（吉隆坡）等（見附圖2）。

有別於船班表當中以港市為主的地名，廣告當中所出現的地名範疇更廣。廣告是《叻報》主要的獲利來源，因此該報廣告眾多，甚至經常佔了大部份的篇幅。<sup>⑩</sup>許多商家刊登的廣告內容中，多會記載商號的所在地、各地的分行、各地的代理人，以及商品與服務的取得地點。

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報章廣告的刊登習慣有別於今天的廣告，現今廣告大多只出現一天，早期則是具有高度的連續性。以1880年代在《叻報》刊登啤酒廣告的明嗎也洋行為例，它的廣告於1887年至1914年出現，該廣告記錄了啤酒的限制銷售地區，出現加勝巴、三寶壠、泗里末、望加錫、檳榔嶼、日里等地名。除了地名之外，許多廣告也顯示該店家的地址（見附圖3）。此外，以20世紀初在《叻報》刊登廣告的一家廣州藥商敬和堂為例，它的廣告於1918年11月12日至1919年5月14日，長達半年的時間幾乎每天出現於《叻報》。該廣告記載了馬新各地的代理商，因此可以見到石叻大馬路、庇能新街、埧羅戲園前、吉隆茨廠街、金保、太平、綿蘭廟前街、馬六甲、暹羅新馬路等多個地名。<sup>⑪</sup>（見附圖4）

除了列明東南亞不同華入市鎮之外，也有的廣告呈現出市鎮內的小尺度地名，例如在同一天的報章中，另一則售賣白蘭地酒的廣告便列明該產品在新加坡的代理店家，從中可以見到許多有關「律」和「實得力」的使用，例如牛車水大馬路、土庫街、梧槽律、柏基士實得力等。值得注意的是，該廣告出現的時間長達兩年又七個月的時間（見附圖5）。<sup>⑫</sup>這些為數眾多的廣告無形中令地名語詞的使用更加普及。

<sup>⑩</sup> 黃國富，〈在傳統與現代性透譯之間的媒介實踐：新加坡《叻報》的萌芽與開展（1881-1911）〉，《傳播研究與實踐》，第5卷，第2期（2015年7月），頁167。

<sup>⑪</sup> 這些地區分別為今天的新加坡、檳城、怡保、吉隆坡、金寶、太平、棉蘭（印尼）、馬六甲，以及暹羅。

<sup>⑫</sup> 自1918年7月1日至1921年2月25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之後，《叻報》充斥着許多以藥品、香煙、酒、醬料等日用品為主的廣告，與19世紀的洋行廣告、保險、器材等主打社會上層人士的廣告不同，因此可以看出主要宣傳對象轉往普羅大眾，這個普及程度加強的趨勢或許也解答了大量地名在20世紀開始出現地名標準化現象的原因。

綜上所述，華人地理空間的形構並非是靜態的，而是隨着對本地地理知識的建構而循序漸進地呈現在文字化的地名當中。在尙未有國家或機構對於各類（中文）名詞進行人為規範時，<sup>⑩</sup> 這些每天出現的新聞及廣告資訊無疑成為地名標準化以及建構華人地理知識的重要推手。換句話說，越重要的地方或越常出現的地名，它的標準化情形會越顯著，反之進程則較慢。此外，這些因為華人在東南亞商業活動及社會網絡關係而常見於報章新聞、船班、廣告等的地名，也無時無刻不在形塑着華人對東南亞地理空間的想像。

## 結論

本研究以地名為研究對象，討論華人在東南亞與其他南島民族文化、西方殖民者等族群的文化接觸之後，如何藉由對新環境的命名以及各種外來語地名的詮釋，形構出對於東南亞地理知識的認知圖像。對於這個問題，本研究試圖藉由19至20世紀新加坡《叻報》當中的地名作為主要材料，回答華人如何使用本身的語言文字重新詮釋新的環境，同時將之內化成為形構地理知識的素材，以及這些語言文字如何在當時逐步標準化，形成今天所見到的東南亞漢字地名。

無可否認，《叻報》僅是華人社會眾多文字材料當中的冰山一角，為了使《叻報》的地名材料更有說服力，本研究也輔以其他的材料，特別是納入同一時期的中文地圖（附錄1）以及現場田野材料（附錄2）來進行交互參照，以呈現《叻報》的代表性。

### （一）《叻報》中的東南亞地名

19世紀是東南亞的大開發時期，大批此時南來的華人在此所面對的，是

<sup>⑩</sup> 馬來西亞新聞部2004年成立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主要目的在於制定和統一本國名詞和詞彙的中文譯名，範圍涵蓋人物、機關、地名等，該理事會由官方和民間所組成，以便為新聞工作者、出版業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參考。

一個遠離中國漢文化圈的異域，面對許多外來語的地名，華人在形構在地地理知識的過程中，創造了許多的地名。按照這些地名的詞素，可分為固有詞、音譯詞以及複合詞的地名，研究發現，這些地名的出現並非隨機產生，其背後可以以族群互動的角度來理解，展現在地名的空間尺度、族群交流程度和數量上的特性之上。（見附表2）

固有詞地名是華人以本身的語言詞彙對於地方重新命名的結果。在空間特性上，人口聚居的市街聚落內部或是由華人所開發的地區，空間的尺度一般較小，主要是一些與華人生活息息相關，經常接觸且熟悉的空間，例如市鎮內部的地標、道路等。在馬來亞甚至其他東南亞地區，華人在經濟形態上以商業為主，因此可以見到市鎮多擁有高比例的華人。由於這些地名為華人所創造、使用，屬於純粹華人的命名系統，一般並不為其他族群所熟知，因此與其他族群交流時較難使用，族群互動程度低，其數量也較少。

音譯詞地名是華人直接將外來語詞的地名以漢字記音的方式記寫，絕大部份的音譯地名漢字都是以福建話發音，使福建話的漢字成為現今東南亞中文地名的基礎，這種現象與大眾傳播媒介所在地都是福建人佔優勢的港市有關。音譯詞地名使用的空間尺度較廣，包含地區名、行政區、市鎮名、島嶼名等，它牽涉到華人在非主流的環境中須與其他族群及殖民政府的商業往來及交流，因此以音譯的方式加強地名的實用性，大部份的本地地名都屬此類。《叻報》地名詞素分類以音譯詞為多的現象，與其他語詞例如人事、工具產品、管理制度等有很大的出入，它們以固有詞居多，可見地名對於華人在本區生活與其他族群互動上的重要性。

複合詞地名則綜合了固有詞和音譯詞地名的特性，不僅地名的空間尺度上兼具大尺度和小尺度的地名，而且由於複合詞當中的漢字固有詞多出現在通名的部份，作為音譯詞專名的修飾，因此它所能夠提供的族群互動會比固有詞來的高，但仍然不及純音譯地名，在數量上也介於固有詞和音譯詞之間。

上述這三個分析結果對比康培德對於巴達維亞《公案簿》當中對於官職、機構的外來語名詞分析，<sup>113</sup> 可以見到巴達維亞華人對於一些不熟悉的外來語詞，選擇音譯表示的比例較高，一些比較熟悉且能夠以華人傳統固有詞來指稱的詞彙，音譯比例則較低。本研究的成果也呼應康德培的分析，但若

<sup>113</sup> 康培德，〈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頁261-290。

把焦點放在地名之上的話，還能夠發現這種熟悉（趨向固有詞）與不熟悉（趨向音譯詞）之間，還多了一層空間尺度上的分佈規律。在村鎮這些空間尺度較小的華人聚落內部，自然出現較多的固有詞；一些尺度較大，原來就已存在的外來語地方及地區名，則多使用音譯的方式來詮釋。

## （二）地名的詮釋與意義賦予

無論是以華人固有詞命名的地名，還是音譯自外來語的地名，兩者都牽涉華人對本地區的想像與詮釋。在固有詞方面，可以看到華人以自己的語言和文化認知體系來認識南洋這個新的環境。音譯詞方面，雖然看似將地名以外來語發音，直接挪用，但經過漢字統重新詮釋以後，便脫離音譯詞原來的意義，成為具有其他意義的新地名。

一般而言，這些音譯地名會以兩種形式進一步被重新詮釋。其一，許多常用的地名，特別是一些重要市鎮，由於經常為人所使用，因此會出現簡化的現象，形成以較少或單一文字表示的地名，例如「星」，被賦予新的意義指稱新加坡。另一種情況是一些地名通名，由於經常出現於地名之中，因而在音譯的過程中逐漸產生固定的對應漢字，甚至出現內化的現象，並且取代華人原來的固有詞，為華人使用，例如律、鑑榜成為華人習慣性對於路、村莊的指稱。有的地名通名甚至內化為具有價值判斷的地理名詞，例如烏魯、鑑榜成為形容落後的代名詞。這樣的情況也與康培德在吧城《公案簿》的發現類似，隨着人們對於殖民體系熟悉度的加深，音譯詞也開始變多，甚至出現一些規律性的音譯用字，這些用字也逐漸被賦予特定意義。<sup>⑭</sup> 惟在音譯詞地名當中，華人選用類似語義且發音相近的漢字的情況較少見，畢竟地名並不像官職及機構一樣，能在中國名詞中找到對應。

## （三）地名的標準化

華人所創造的地名或地理知識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呈現動態的變化過程，許多地方在剛開始產生地名時，往往同時出現多種詮釋方式，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間，許多地名也出現消失、沿用或改頭換面的標準化過程，並在20世紀時逐漸形成與現今較為相似的地名。在標準化的過程中，地名並不只是朝向與外來語趨同的方向發展，許多記音的地名在標準化過程中出現文字雅化的現象。地名的標準化過程牽涉到人們對環境詮釋與認知的變遷。研

<sup>⑭</sup> 例如以「噠」或「實噠」來指稱在地方或部門中握有最高權力的荷印高階殖民館員。

究發現，在尚未有國家或機構對地名進行規範時，報章上的船班、告示，以及每天大量出現的廣告其實在地名標準化以及華人地理知識的普及化進程中扮演要角。

總體而言，《叻報》在華人大量移入馬新地區的過程中，記載了許多華人與其他文化接觸後所產生的元素，並將這些元素以大眾傳播的形式普及化，對於華人在地地理知識的形構有着很大的貢獻。報章與民間的地名使用是相互影響的，報章所使用的地名是由地方而來，但它也會收羅到不同群體對於地名的詮釋，進而在多次使用上逐漸標準化，最終以文化普及傳播的優勢影響地方人士對地名的使用。《叻報》所收錄的地名材料也為我們勾勒出19世紀至20世紀本區現代化進程中，馬新地區華人地理知識的圖像及變化過程，此一過程與當代社會有着顯著的連續性，有助於對現今社會文化變遷歷程的理解。

（責任編輯：唐金英）



附圖1：《華英通語》（左）及《通勝》轉載華英通語（右）當中漢字化的外來語

數目 生意、日常通用詞語		華英通語			英文字母
One 一 温	二	Two 二 地	三	Three 三 夫里	<p>為使讀者便於閱覽起見(本編)內中文均由左讀起</p> <p>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p> <p>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p> <p>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p> <p>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p>
Four 四 料	五	Five 五 夫夫	六	Six 六 普士	
Seven 七 會契	八	Eight 八 壹	九	Nine 九 乃香	
Ten 十 吞	十一	Eleven 十一 衣拉契	十二	Twelve 十二 飛路夫	
Thirteen 十三 吸天	十四	Fourteen 十四 料夫	十五	Fifteen 十五 飛夫夫	
Sixteen 十六 普夫夫	十七	Seventeen 十七 推溫地	十八	Eighteen 十八 推溫地	
Nineteen 十九 乃香夫	二十	Twenty 二十 推溫地	二十一	Twenty one 二十一 推溫地温	
Twenty two 二十二 推溫地地	二十三	Twenty three 二十三 推溫地夫里	二十四	Twenty four 二十四 推溫地料	
Twenty five 二十五 推溫地地夫	二十六	Twenty six 二十六 推溫地普士	二十七	Twenty seven 二十七 推溫地會契	
Twenty eight 二十八 推溫地壹	二十九	Twenty nine 二十九 推溫地乃香	三十	Thirty 三十 吸地	
Forty 四十 料地	五十	Fifty 五十 飛夫夫	六十	Sixty 六十 普士地	
Seventy 七十 會契地	八十	Eighty 八十 九	九十	Ninety 九十 乃香地	
One hundred 一百 壹吸對	一百一十	One thousand 一千 温豆臣	一千零一	Ten thousand 一萬 天豆臣	
One hundred 一百 壹吸對	一百一十	One hundred catties 一百斤 温吸對地地	十斤	Ten catties 十斤 顯地地	
Ten taels 十兩 顯地地	兩	One tael 一兩 温地	錢	Cash 加示	
One dollar 一圓 温打磅	兩	Half dollar 半圓 夫夫打磅	銀	Cents 地仙	
Twenty cents 二圓 推溫地地仙	兩	Money 銀	銀	Silver dollar 普温打磅	

圖片來源：通勝書圖片轉引自《香港經濟日報》，〈睇通勝學英文：「都要撈英吉利」點解？〉，2015年9月11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690350/%E7%9D%87%E9%80%9A%E5%8B%9D%E5%AD%B8%E8%8B%B1%E6%96%87%E3%80%80%E3%80%8C%E9%83%BD%E8%A6%81%E6%92%88%E8%8B%B1%E5%90%89%E5%88%A9%E3%80%8D%E9%BB%9E%E8%A7%A3%EF%BC%9F?r=cpsdlc>。

附圖2：《叻報》船班表

輪船	開行	目的地	日期	時間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四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新開	開	新開	廿七日	下午二點

資料來源：《叻報》，1887年9月14日，版8。

附圖3：19世紀《叻報》廣告當中的地名和街名



賣出酒密

啟者本行...



客發烟宋呂正

啟者本號親自在小月宋探辦...

附圖4：敬和堂藥行廣告（1918年11月-1919年5月）

**廣州南門直街**

# 敬和堂

馳名各項膏丹丸散

民國八年二月五號

**肥兒疳散** 專治孩兒疳積食積由積致瘦胃不健不思飲食百  
夜啼哭或黃瘦或腹脹或嘔吐或泄瀉或疳積或疳疔或疳瘡  
每樽銀一元

**培元種子丸** 此丸能助精補氣腰腎培元氣滋  
水調火專治男子腎虛身弱腰痠  
血弱頭暈眼花皮黃骨瘦腰膝痠  
痛夢遺不固心神驚悸手足酸軟  
後餘滿老人夜尿不安眠水不  
滿心腎不安虛虛能壽百病皆除  
本藥元則凡事無不歡樂  
每盒壹元貳角

**調經烏雞白鳳丸** 此丸能通內外調和氣血  
無所不至或虛或實或弱或壯  
月事不調或多或少或前或後  
經前腹痛經後血暈或行而  
帶下或赤或白或崩漏或  
血崩或胎前產後諸症  
無不神效  
每盒壹元貳角

加料衛生丸 每盒一元二角  
正白帶丸 每盒一元二角  
婦科白帶丸 每盒一元二角  
婦科調經丸 每盒一元二角  
婦科止痛丸 每盒一元二角  
婦科調經丸 每盒一元二角  
婦科調經丸 每盒一元二角  
婦科調經丸 每盒一元二角

石叻大馬路會豐商店總經理  
吉隆坡大馬路會豐商店  
檳城大馬路會豐商店  
怡保大馬路會豐商店  
芙蓉大馬路會豐商店  
馬六甲大馬路會豐商店  
新加坡大馬路會豐商店

附圖5：林美孖田萬蘭池酒廣告（1918年7月-1921年2月）

唯一探辦人和蘭士蝶列地咧冷公司  
寫字樓設在新加坡亞里門牌五十一號五十三號五十五號  
五十七號



◆林美孖田萬蘭池酒  
啟者現今叻地所最通行之頂上佳釀林美孖田萬蘭池酒係  
由法國林美孖田公司所創設該公司成立於一千七百二十  
四年

下列之商店均有發售

振源興牛車水大馬路	錦興土庫街	新源成仰光街
振源興勿基	廣建興禧律	陸南興惹蘭芝律
振源興勿基	錦昌漆木街	天興隆禧律
生源和禧律	承德和禧律	瑞利吉靈街

Sole Importers:  
**THE HOLLAND STRAIT TRADING CO., LTD.**  
INCORPORATED IN HOLLAND  
51, 53, 55, 57, The Arcade, Singapore.  
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七月一號

附表1：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馬新地區常用的地名通名及其中譯

通名	原文	中文譯名	案例
岬角	Tanjung	丹絨、丹容	丹戎勝卓、丹容加東、丹戎巴葛、丹絨牛
海灣	Teluk	直落	直落亞逸、直落勿蘭牙、直落安申
河口或河流交會處	Kuala	掛勝	掛勝港沙、柯勝欖保
上游	Ulu, Hulu	烏魯、吁魯	吁魯彭亨、吁魯白蠟、烏魯底欖
村莊	kampung	鑑榜、甘公	鑑榜嗎魯、甘公峇汝、甘公茫古魯、甘公麻六甲
山	Bukit	武吉	武吉巴梭、武吉智馬
新	Baru, Bahru	峇魯	北干峇魯、北干嗎魯、柔佛峇魯、鑑榜嗎魯
路	Road	律	利峇峇利律、羅敏申律、梧槽律
街	Street	實得力	朱里亞實得力、哥勞實得力

說明：上述地名來自各年代的《叻報》，按上述地名順序，資料來源如下：1888年3月1日，版4；1931年4月10日，版13；1932年1月4日，版4；1888年4月2日，版6；1932年1月4日，版5；1888年6月1日，版6；1891年3月7日，版2；1891年5月22日，版2；1888年3月2日，版8；1891年8月15日，版2；1891年5月3日，版2；1931年4月10日，版7、10；1931年4月10日，版7；1891年7月31日，版2；1891年3月31日，版2；1888年3月1日4；1888年4月2日，版2；1891年2月24日，版2；1931年4月10日7、10、13；1932年1月4日，版5、11、14；1931年4月10日，版11；1932年1月4日，版1。資料文檔可參見：<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l>。

附表2：《叻報》所載東南亞地名的分佈特性

詞素 \ 特性	空間尺度	族群互動程度	數量
固有詞地名	偏小	低	少
音譯詞地名	偏大	高	多
複合詞地名	兩者兼具	偏高	較多

### 附錄1：1932年潘醒農所編《新加坡指南》的馬來亞鐵道圖（局部）



圖片來源：潘醒農編，《新加坡指南》（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32）。

圖片說明：原圖名為「馬來半島地勢圖」，然圖中並未顯現地勢，為避免混淆，因此以「馬來亞鐵道圖」作為圖說。這張1930年代的馬來亞中文地圖也呼應了《叻報》所載的東南亞地名。如固有詞（如森美蘭的七條石、吉隆坡的三個石，意指里程碑）、音譯詞（如巴羅、士乃等）、複合詞（如吉隆坡的蘇丹街），以及一些被內化的外來語，如新加坡的荷蘭律、森美蘭的雙溪加老馬，都出現在其中。事實上，當時中文圈的報業記者、出版業者（如潘醒農）、教育工作者、文人等往來密切，他們透過大眾傳媒、民間地圖出版，甚至教科書編輯等形式，逐漸形塑着當地華人對於周邊地理知識的認知。

### 附錄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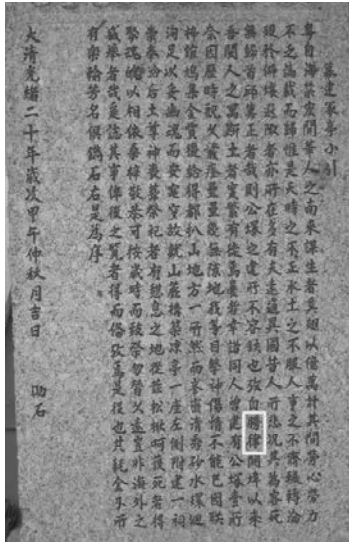
除了《叻報》資料之外，本文也附上同一時期的民間文獻，反映新加坡《叻報》地名資料其實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及代表性。照片為筆者所攝。

圖2-1 咸豐二年（1852）碑



圖片說明：由碑文可知，至少在咸豐二年，「甲」就已成為馬六甲的簡稱。

圖2-2：「募建冢亭小引」碑



圖片來源：《募建冢亭小引》（光緒二十年〔1894〕），碑存馬來亞霹靂太平福建義山。碑文中出現「勝律」。

圖2-3：1921年一座墓碑承造者招牌



圖片說明：招牌上出現「吉隆」和「美朱律」字樣。

圖2-4：大笨珍廟宇內的運勢表



圖片說明：大笨珍一家廟宇內的地方運勢表所顯示的地名「大笨珍」。

圖2-5：「芙蓉爐骨捐題銀芳名」碑（1860年之前）



圖片來源：碑存馬六甲三多廟內。碑文中出現「芙蓉」(Sungai Ujong)地名。

圖2-6：1895年填羅古廟法器



圖片說明：法器上有「填羅」字樣。

#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lace Names by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 Study of *Lat Pau*, 1887-1932

Wee Chuen PEK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 Abstract

Through a close study of the place names in the “*Lat Pau*”,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betwee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Lat Pau*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daily newspaper during the time. It was headquartered in Singapore and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Most of the newspaper’s content is related to various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many of the newly-opened regions. Many of the place names that are well known today were still fresh for the Chinese at that time. Thu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inevitab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and standardizing those foreign place names, and many new place names were therefore created. Having collected the place names appearing in the *Lat Pau* and supplemented with other place-name material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s of these place names and shows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geospatial view.

**Keywords:** *Lat Pau*, Singapore, Malaya, place name, overseas Chinese

---

Wee Chuen PEK,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Blok B&C,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E-mail: weechuen.pek@newera.edu.my.